

时代洪流培育我坚强奋进（四）

——马咏南细述七十多年风雨历程

1966年8月17日后，牙律县军警忙着查外侨证件，查到未缴纳税款的华侨就入狱，付清后才放人，9月16日，牙律侨团四位领导被逮捕，其中两位一去不复返，下落不明，而余下两位化了大笔钱才赎回一命。这时候，父亲催我赶紧拿路条跟着母亲去雅加达，剩下的布料由父亲去处理和断后。父亲再三叮嘱我，不可与共和大学校友有联系，让他们以为妳已经回中国深造。

9月23日，我重回雅加达。发现一年前充满革命激情的巨大标语和海报，都消失殆尽，只有汽车、牙膏、啤酒的广告。电影院多数是庸俗的爱情片，如中港明星的“香港-东京-夏威夷之恋”宣扬中国美女与日本人一见钟情的闪电结婚的故事，还有美国警匪恶斗片，宣扬美警战无不胜的英雄气概。

我自从离开牙律中华学校的老师队伍，只和家人窝居在家，我好比是天空中一只弱小离群的孤雁，在排华浪潮中毫无头绪地飞翔。周围不是一群可爱的学生，而是一群令我气结爱赖账的三轮车夫。面对这些低层的人民，我从老师的身份得转变成“虎妞”了，软硬兼施才能追讨租金。

为了帮三轮车夫赎回三轮车坐垫，我得亲自出马去警察局缴罚款，并且保证教车夫认识交通规则。从而提高我在车夫们的威望。当时印尼军方视大学生为“宠儿”，为了有活动的空间，我想方设法重回校园。1967年我先去日语学院读日语，它不需要印尼籍证件和印尼文高中文凭，但是日语学院“威望不够”，没有大专生的文凭。

后来通过关系，我成功转进印尼外语学院念英文系，除了英文系，还有阿拉伯文系，日文系。在外语学院我们拥有蓝色的外套制服，每天上课得穿上以证明你是该校的大专生。院长是宗教部长的侄儿，教育部长也网开一面，只等到要参国家考试，才出示考生的国籍证和毕业证书。

我是合格的但没有文凭的毕业生。我只能仰天长叹：时不我予！并自我安慰：这套蓝校服是我的“护生服”，它庇佑我逃过无数劫难。穿了蓝制服，我就胆大敢接待有难的共大（共和大学的简称）校友，买他们制做的食品，外埠校友要搭飞机出国可借宿在我家。

不知不觉我成了“及时雨”，有难的共大校友都找我。至到1969年底，传来噩耗：共大印尼文学系讲师，也是名作家普拉穆·阿南达杜被关进布鲁荒岛，其中有共大文学系的学生会主席也一起囚禁在布鲁荒岛，1965年时，我被选为文学系的副主席。担心我被牵连，向我报告噩耗的是经济系的爪哇族同学，他叮嘱我，此后不准接待共和大学的校友！当父亲从电台和报纸得知上述新闻后，召集全家人，不准收留我的朋友，并且立刻叫我搬到与同乡人合住的房子。

三年后，英文系的讲师为我不能参国家考试而惋惜。说

岛，出于保护我的安全，他冒险通知我要断绝与所有的共大校友！那时候谁是朋友，谁是坏人，我们也不知道！我很感谢爪哇族同学不出卖朋友的高贵人格。

我不再联系共大的校友，自我思考我们的理想是否太遥不可及，我是属于什么阶级？对比三轮车夫，我是车主，拥有三轮车为生产工具，是剥削阶级；三轮车夫是生产力，在风雨中赚血汗钱，是被剥削阶级。我空喊：“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”是自欺欺人？！我三兄弟是学汽车修理，不如开汽车维修行业，我来卖汽车零件。毓南弟形容此改行是：《东风浩荡新天地，大海汪洋无际，今日咱家投商海，暂不贬资产阶级》。

但是，父母亲认为小弟应该去念高中，老四道南为人厚道，不是做生意的料子。先由我和毓南开摩托修理厂。摩托车零配件不多，毓南自个儿能管理。1970年我和马金祥注册结婚，获得印尼籍证，跟随丈夫的国籍是华侨妇女拿到印尼籍的最快途径。最初我们开汽车零件店，专门做外地的生意，卖

1997年，国民福利基金会与untar佛教大学联合在万丹举行义诊，中为郑眉姐医生与马咏南，郑医生现为印华妇女会新届主席。



1997年，国民福利基金会与untar佛教大学联合在万丹举行义诊，中为郑眉姐医生与马咏南，郑医生现为印华妇女会新届主席。